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毛泽东的“打鬼战略”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王 毅
【史海钩沉】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张 从
【往事非烟】	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	何子溪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六）	阎长贵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毛泽东的“打鬼战略”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 王 毅 •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全面、公开爆发是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的，而这篇社论的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法西斯”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字眼比上面短短的几个字更令人毛骨悚然了，因为它们的每一笔一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都是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惨遭屠戮和横加在亿万国人头上无尽的苦难。在经历了那样巨大的牺牲之后，谁能说我们不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这几个字的渊源呢？借用费尔巴哈的话说：“鬼怪是过去的阴影，鬼怪必定将我们引回到这样的问题：在那鬼怪还是有血有肉的存在者时，它曾经是什么？”

我们说：“横扫牛鬼蛇神”决不仅仅是对“文革”内涵的简单形容和文学化的比喻，而且更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文化战略。本文中将要叙述的自50年代末开始，直到“文革”时瓜熟蒂落、由毛泽东亲自制定，反复申明的“打鬼战略”，就可以对此给予确凿无疑的证明。

一般说来，人类文明既然是从原始时代演化而来的，那么后世就或多或少总要遗留有那个遥远时代的观念及其文化现象。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袭用某些有关鬼怪妖孽的语言风俗、文艺素材等等，本是最平常的事。然而也正因为人们进入了现代社会，所以这种袭用总是被限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例如有关神话题材的文艺作品），而决不会笼盖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因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总体面貌即如马克斯·韦伯所说：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

然而与现代文明这种“祛除巫魅”的进步趋向完全相反，自50年代末开始，“牛鬼蛇神”的阴影逐渐笼罩了整个中国大陆。

在现代中国，“牛鬼蛇神”原来主要是指一些流传很广的传统小说、戏剧的内容，而其演变成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并且关系整个社会文化走向的概念，则是从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开始的。例如在1957年3月8日《和文艺界的谈话》中，毛泽东与文艺界的负责人和著名演员反复谈了“鬼戏”的问题，他说：

我不赞成牛鬼蛇神，让他演出来批评一下；……一些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希（稀）奇。……社会上牛鬼蛇神很多么！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在谈鬼戏的时候，已经一再指出社会上有牛鬼蛇神，而且很多。4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一方面重申了可以有一点牛鬼蛇神戏的观点，同时再次郑重提出批判错误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被《五·一六通知》奉为“文革”指南的那段著名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数月之后，对“大鸣大放”的鼓励急剧转变为残酷的“反右斗争”，而这转变的背景之中，就包含了毛泽东对“牛鬼蛇神”的判断有了重大的发展，所以在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著名的“反右”纲领性文献中，他用了“呼风唤雨，推滔作浪”，“黑云乱翻”等等人们通常用来形容魔鬼的语汇，用以指斥“资产阶级反动右派”之恶毒。接着，他又直接用最严厉的口吻把他们宣判为十恶不赦的恶鬼，并号召民众“歼灭这些丑类”：

本报及一切党报……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们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一边动手歼灭这些丑类。……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在这个号令下，人们对“右派”的批判讨伐，很大程度上成了把他们判定为极其凶恶诡诈的野兽和魔鬼的指证，仅以当时《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大批判文章的骇人标题为例：

《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见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斩断张伯钧戏剧界的魔爪》（见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右派分子是“狼”，不是“外婆”》（见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见195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江苏搜出了一个狼窝》（见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真理的烈火要烧毁牛鬼蛇神》（见1957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福建民盟又叉着了这条凶恶的毒蛇》（见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扫清工程技术界的牛鬼蛇神》（见195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一条毒蛇——右派分子伍俊卿》（见《中国青年》1957年第16期第12页）
……

与此相辅而行，报刊上还非常流行用绘画将“右派”描绘成各种丑恶凶残的魔鬼和野兽。比如：著名诗人汪静之等人将“右派”指证描绘为“吃人血的狼”（见《新观察》1957年第11期第5页）。又比如：“反右运动”中，将资本主义以及章乃器等“右派”统统指证为魔鬼。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讨伐已经远远超出了理性批评的范围，而是一种充满“巫魅”气息、近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对异端、异教的审判和诅咒了（详见拙文：《“大批判”与诅咒巫术》，《香港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春季号）。

根据陈晋《在“不怕鬼”的背后——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第67—74页）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1959年春天以后，毛泽东的“打鬼战略”有了重要的发展。在1959年4月15日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指出：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一是台湾问题，一是西藏问题。为了应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局面，毛泽东强调：“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毛泽东引用了中国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则故事，并总结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知道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是毛泽东在重要的会议上第一次把境外的敌人称之为鬼。接着，在同年5月6日接见十一个国家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毛泽东用更明确的语言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四天后的5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团时又说：

马列主义教我们不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清朝皇帝等鬼。……纽约、伦敦都有。

毛泽东这些讲话有几点重要的意思：1、资本主义是鬼；2、自己的一切敌人都是鬼；3、鬼遍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4、他自认为“不怕鬼”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把境外的敌人视之为鬼，而且把境内过去的敌人也视之为鬼。

大约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实施《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编撰工作：他指示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专门落实这项任务。此事即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至1959年夏天，书已基本编成，其内容是从中国历代小说中选出的各种叙述人们如何不怕鬼、并且能够驱鬼除妖的故事。何其芳随即把此书初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曾节选出其中一部分，在一次中共中央工作全会上印发给与会者。

不久，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爆发，《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因此而一度终中断；但是同时，这一间歇也使毛泽东能够结合“庐山会议”以后的形势，将其“打鬼战略”中增添进了最为关键的内容。

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再加精选、充实，并详加注释（因为原文是比较古奥的文言）。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亲自撰写序言，以说明编选、出版此书的深意。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先起草一篇，再呈他审阅。于是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1961年1月4日召见何其芳，谈了打鬼“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并特别嘱咐何其芳将他的这个意思补写进序言。谈话结束前，毛泽东又告诉何其芳：他最近写了几首批判修正主义的诗。这几首诗后来何其芳读到了，其中之一有这样几句：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

毛泽东此诗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自己是被“千重”、“万种”的凶神恶鬼包围着；第二，与1957年将“右派”视为“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以

及1959年初主要将境外的敌人和西方国家视为鬼魅相比，此时毛泽东眼中的魔鬼不仅完整地包含了国内与境外这两部分敌人，而且已经将他们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回去以后对《序言》做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后的《序言》呈送毛泽东，并附信说明自己增写的部分“缺乏警策之处，……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毛泽东收到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8日会议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了这本书，并说：“我也60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读了《序言》的修改稿之后，又亲自执笔在其结尾处增写了一段纲领性的文字：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今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更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次中央全会于1961年一月作出拥护莫斯科会议的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订了今后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警世骇俗了（王毅注：本文中的黑体字是我标出的）。

很显然，毛泽东是把“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这一对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作为战略性的纲领提出来的，而他在这里胸有成竹地宣布的“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则空前明确地预示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鬼运动”即将到来。

1月23日，毛泽东再次召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随即把上面一段念给何及在座的人听，然后又将手稿给大家传看。之后，毛泽东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具体指示：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嘱咐他把稿子誊清后再呈他看。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序言》改好，在1月24日早晨让人呈送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您修改的稿子修改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按照昨天（胡）乔木同志（王注：胡乔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意见稍微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审阅。”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这里所说的文字上的变动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恰巧供职于何其芳曾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所以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的这份手稿，将手稿与后来正式出版时署名何其芳撰写的《序》相比较，毛泽东强调的“需要打鬼”、“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两句被删去了，这可能是因为胡乔木等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用如此直露而严厉的语言披露出“打鬼的战略”还不太适宜，而且与《序》的署名作者何其芳的身份地位不相吻合。但是，今天的读者不难看出：正是这些严峻的话语，才最真实地表现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就审完了这份稿子，并立即交付何其芳。他在何的来信旁边复信：

何其芳同志：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再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一望可知，毛泽东是把《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经他多次口授、亲自反复修改的该书《序》，作为自己的战略纲领而郑重地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发布的。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打鬼战略”的内容，除了上面抄录的他亲笔加入的文字之外，我们不妨再抄录这篇《序》中的一段：

……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及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它们或者穷凶极恶，面目狰狞，或者形容妖冶，狐媚惑人，……其变化多端和诡异的程度，可以使过去的故事里的鬼相形见绌。……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反动的一面也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崇，总要捣乱。

显而易见，这里不仅把众多国际的政治力量和国内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统统视为魔鬼，而且更进一步强调了魔鬼们“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十恶不赦的禀赋和无穷诡诈的伎俩。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法庭以“魔鬼帮凶”的罪名将几十万无辜者推上火刑场的历史，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会使人怵目惊心的话，那么，每一个还记得自己数千万同胞是怎样背着“牛鬼蛇神”的罪名和永世的屈辱被“横扫”进坟墓的中国人，在仅仅隔了三十年而重读当初这份“打鬼战略”时，难道不会毛骨悚然吗？

《不怕鬼的故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于1961年2月正式出版。因为这本表面上貌不惊人的小册子实际上是一部战略性的著作，所以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它。例如在1962年1月14日会见某国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在重复了此书《序》中的一些观点之后，问客人是否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或法文版，并表示要将此译本送给他们。又说：“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某某是半人半鬼，某某是个鬼，别的鬼还没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怕鬼的故事》出版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心目中魔鬼的范围再一次扩大了。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郑重向中共领导人灌输了他的“打鬼战略”。例如在1961年11月和12月，他两次批示将自己的《读报诗》（即前引“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等等）“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印发各同志”。而几个月之后的1962年9月，毛泽东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又写下了一段著名的文字，以无比明晰的语言说明了“阶级斗争”与“打鬼战略”之间的关系：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

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在全国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亦即“文革”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预演），又反复阐明了“阶级斗争”与“牛鬼蛇神”的关系，例如他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中说：“这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随后又说：“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搞阶级斗争了。……‘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的，‘四清’能搞出来。”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些指示中提出的撇开常规国家机器，而用“运动”的方式清除他满眼看到的“牛鬼蛇神”，这已经十分接近“文革”的主旨了。所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曾明确叙述过这个履薄冰至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很多年的毒”。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横扫牛鬼蛇神”就成为亿万人民必须投身其中的最神圣事业，例如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的号召：“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

总之，作为“文革”的纲领，“横扫牛鬼蛇神”的产生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牛鬼蛇神”的外延不断扩大并且日益清晰，而且所有这些敌人的政治定义、文化定义和人格定义，更被日益确凿地赋予魔鬼身上的一切品性。因此，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而又极为严肃的准备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全面爆发也就是必然的了。

（根据《“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文革”的野蛮性、蒙昧性与疯狂魔力是从哪里来的》第二章（“横扫牛鬼蛇神”与驱鬼巫术）第二小节改写而成，删去了原来所有的引文出处注释。）

□ 来源：王毅：《“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文革”的野蛮性、蒙昧性与疯狂魔力是从哪里来的》

~~~~~

## 【史海钩沉】

###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 张 从 ·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异端”的定义：“异端指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或教义，通常含有负面的含意，或称旁门左道；但也可指不重要的思想流派，即小道。”在北大文革中，紧跟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积极支持和参加文化革命，并紧跟领袖支持的聂元梓的，自然就是正统，而对文革和领袖及其支持者有怀疑、不敬甚至反对的，自然就是异端了。还有个别人，思想比较奇特，不同于常人，有时发出惊世骇俗的不同于主流思想的言论，也可以称其为异端人物。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在北大陆续出现过不少具有异端思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笔者的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

#### 一、“造三个大反”的乔兼武

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学生。1966年8月30日，他与另一学生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而轰动一时。它的三个大反是：“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在这份大字报中，他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建议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上述造三个大反就是“横扫”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造三个大反中最重要的是“取缔党团组织形式”，取缔的理由是“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所以“他们不受群众监督”。至于为什么“砸烂”各级办公室，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当时的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刚被赶走，还没有分裂成为两派，他贴大字报纯属个人行为。从他的改名和大字报内容来看，他的作为可能比较轻率，属于文革初期思想活跃，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其思想大致仍属于“巴黎公社式大民主”一类。可以将他的观点归纳于“反党”，但实际上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关于党的领导看法，实际上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关的原则，是一种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后来随着文革进程的发展，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团组织实际被停止活动，党和政府被造反派夺权，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有的政权，似乎验证了乔兼武大字报的预见性。

在他贴出大字报的当日晚，北大文革筹委会召集大会批判乔兼武，宣布他为反动学生。当时有人公开为他辩护，反对以言定罪，所以批判会比较缓和，会后也没对他采取任何措施。在1966年12月伊林、涤西“反林彪大字报”贴出后，乔兼武又贴大字报为伊林、涤西叫好。此后，他才遭到进一步迫害。

然而，乔兼武大字报的思想过于超前，取缔党团组织超过了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底线或被认为极不现实，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位学生的胡闹，并未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关注。

## 二、杨勋和杨炳章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教师，1931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1年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属于“左派”积极分子。杨炳章是她的弟弟，我的中学（北京101中）同学，1963年被保送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1964年自动退学，在北大听课。1966年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江青在会上的讲话引起了他们的反感。7月26日上午，杨勋姐弟带着他们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大字报手抄件，来到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他们去接待站，登记后被戚本禹带到钓鱼台国宾馆，见到了江青。杨炳章要见毛泽东，江青说毛很忙不能见，信件可以叫给她代转。杨炳章只好把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是“建议毛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革命，不然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署名杨勋、杨炳章（杨勋弟）。可想而知江青看到信后会是什么反应。

杨勋从1966年8月到11月陆续贴出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称聂元梓是“北大文化革命的扒手”。

1966年12月20日北大文革组织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一张署名杨炳章的纸条，要为“虎山行”辩护，于是群起攻之，当场将杨炳章抓了起来，关在学生宿舍。又派人到他的住处搜查，抄出一个笔记本，

上面写着《红旗十三期社论摘评》等文字，于是认定他为攻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扭送至北京第一监狱。23日，聂元梓又派人把刚外出串联回来的杨勋抓走，也送到了第一监狱（半步桥）。两天后他们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红旗十三期社论摘评”被抄写成大字报公布在北大校园里，被称为当时“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

杨勋姐弟坐了几年监狱后被释放，“四人帮”垮台后得到平反。改革开放后杨勋致力于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安徽调研时写出的调查报告曾受到万里的好评。她的著作有《马寅初传》、《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乡村三十年》等，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获1996年国家图书奖。2004年，杨勋的自传《心路：良知的命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杨炳章被释放后回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1978年考上北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80年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任该校教授，1998年出版《从北大到哈佛》，记录了自己文革前后的经历。前些年他回到北京，在人大国际政治系任客座教授。我和杨勋姐弟曾在北京温泉附近杨勋的别墅里见过面，并接受过他们签名的赠书。

### 三、樊立勤和东方红公社

提起樊立勤，可以说在北大文革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生物系1963级学生，北京密云人。在北大文革中，他先反对工作组，后反对聂元梓，并最早贴出反对康生的大字报。1967年5月，樊立勤和部分北大教师、学生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发起人有：樊立勤、冯德荣、谢佐平、韩琴英、赵习文、俞芷倩、刘帼贞、颜品忠等。5月17日，他们在北大贴出了成立宣言：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

最高指示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汹涌澎湃！

新北大，毛主席的新北大！

但是，我们十分痛心的看到：北大校文革……把新北大搞成独立王国……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是这个校文革，竟然借镇反之机，对奋起批判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令人难以设想的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并盗用中央名义把“井冈山”、“红联军”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横加取缔。有多少革命群众被迫写了“检查”、“交代”、“请罪书”；有多少革命群众被抄了家，剥夺了自由和发言权；又有多少革命群众挨了打，挨了斗，被逼得走投无路，神经失常，甚至有的走上被迫自杀的绝路！

就是这个校文革，在干部问题上继续贯彻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刻又倒打一耙，把这个罪名横加到革命小将头上！

就是这个校文革，在镇压了校内反聂组织之后，又拼凑起一个大杂烩——所谓“新北大公社”，作为自己的御用工具，而把手伸向全市……妄图夺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而独揽之，其野心可谓大矣！

这样的校文革，难道还不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吗？

那些高喊着“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的人，请你们正视一下现实吧！难道历史对你们的嘲弄还不够辛辣，历史对你们的耳光打得还不够响亮吗？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北大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孙蓬一发表的两篇臭名昭著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演说……说明了北大十个月的运动里树立的……而是校文革的绝对权威！这是关键！这是要害！

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北大运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向新北大的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和全市革命人民庄严宣告：“新北大东方红公社”诞生了！我们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波澜曲折……让大帽子铺天盖地地压过来吧！让大棒子劈头劈脑地打过来吧！让咒骂声没羞没脸地飞过来吧！我们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考验出我们过得硬的革命队伍！

1967·5·17

这个宣言用的完全是文革中的语言，但矛头明确地指向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由于樊立勤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态度最坚决，聂元梓对他恨之入骨。

1968年3月27日上午10时许，聂元梓派人在校园里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

樊立勤后来回忆道：

他们逼我承认破坏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有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

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他们是用麻袋把我先蒙住、盖住拉到刑讯室的。到了那里，拉下麻袋，然后给我头上蒙了两层手巾，挡住眼睛，在手巾外又绕了一二十圈绳子，他们把我从楼梯上往下踢、往下踹时，因为我的左右腿均已打断，站不起来了，他们就一层一层往下踢，这时身上已经没有麻袋了。

3月29日，樊立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审讯他的人怕出人命，把他扔在学生浴室附近，被“东方红公社”的同伴发现，送到北医三院抢救。虽然生命被抢救过来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

四人帮被粉碎后，樊立勤作为受迫害典型回到北大，并参加过落实政策的工作。很多人经常看到，他拄着一根木棍，在校园里蹒跚地行走。改革开放后他写过一些经济和体制改革方面的著作和回忆文章。虽然他的思想和观点不一定能够被时人接受，但他坚强的意志和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受到了全校绝大多数人的钦佩。

#### 四、共产青年学会

1967年底，在北大饭厅的东墙上，忽然出现了一篇“共产青年学会成立宣言”，署名是技术物理系1964级学生何维凌、胡定国、王彦。这篇宣言内容大致是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林彪的“顶峰论”提出质疑，声称要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并欢迎其他学生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三个人很快就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转起来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关押在第一监狱。

何维凌，上海人，1944年生，文革前是系里有名的才子，聪明有才华，学习成绩突出。据说自学了4门外语，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等课程学起来十分轻松。系主任胡济民发现了这颗“苗子”，特别批准他不用按照课表上课，可以在全校自由听课。文革开始后被当成“白专”典型受过批判。王彦是北京人，曾任系学生会干部，文革前我和他一起参加过民兵舞训练，有些接触。文革中他们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活动，而是找了很多禁书来读，例如：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吉拉斯《新阶级》，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尼采《扎拉查斯特如是说》，陀斯托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们对文化革命的现象和理论，对共产主义，都有自己一些独特的思考。当然这些异端思想是不能被容忍的，聂元梓及其的追随者在这点上嗅觉十分灵敏，立刻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中。

共产青年学会的成员在监狱中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被释放后没有参加正常分配，而是留校劳动改造。文革后周培源帮助他们落实了政策，留在北大工作。何维凌参与组织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任副组长，他研究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并把这些理论与经济改革联系起来，和陈一谔、邓英淘（邓力群之子）等一起参加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写出了《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与邓英淘合著）等著作。1985～1987年，何维凌任康华“中小企业国际联合公司”总经理。1989年后去了美国，1991年身遭车祸，夫妻罹难于墨西哥。2015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有兴趣者可以参阅。

## 五、井冈山、红联军等组织

“井冈山公社”、“红联军”都是1966年12月在北大出现的组织。他们对中央文革及江青在文革中的行为提出疑问和反对，对校文革表示不满，贴出过大字报，并在下面讨论过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行被校文革及其支持者发现后，立即被打成反动组织，加以批判，大多数成员遭到迫害。其主要成员包括俞启义、赵丰田、马洪路、张志握、魏秀芬、卞宗美、刘秉慈等，都受到了批斗。“虎山行”与红联军无甚瓜葛，被《新北大》报称为红联军“别动队”。“虎山行”主要成员杨作森和支持他们的乔兼武被送进了监狱。中文系学生沈达力为红联军成员，跟俞启义、赵丰田、张志握来往密切，她认为“井冈山、红联军不是反革命组织”，对中央文革的做法“想不通”，认为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在中文系受到多次批判，被迫自杀。

北大校文革的舆论工具《新北大》1967年2月1日，用4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批判“井冈山”、“红联军”、“虎山行”的长篇文章。

## 六、崔子明、张拯、席关培

1967年1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穆欣、杨成武等接见北大代表聂元梓、夏剑多等五人。开始时康生拿着一迭信，对大家说：北大技术物理系有人写信给我，讲到乔兼武、李洪山、杨炳章等意思是替他们伸冤，说有大字报批判他们，他们感到有压力，抬不起头来，你们知道吗？（大家讲了实际情况，并说了自己的看法）

康生说：“对，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见《新北大公社动态》1967年1月7日）

康生说的给他写信的是技术物理系崔子明、张拯、席关培，这三人都是原子核物理专业1963级的学生，文革中派性并不明显，平时也并不活跃。1966年底他们给康生写信，对文化革命中随便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表示不同意见，不料遭到康生的点名。聂元梓

和校文革当然赶紧布置批判。幸而他们的出身都很好，平时同学关系也不错，虽然班上个别极左的人想揪住他们不放，以达到立功目的，但大多数同学还是同情他们的，只是象征性地写了几张大字报，开了几次小范围批判会。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也没有再为难他们。

2017年，崔子明写了《康生批我七宗罪，同学护我一片情》一文，记述了当年的遭遇，收录在本人参与主编的《风雨未名湖》中。

## 七、齐菊生、陈醒迈、程汉良、刘立民

齐菊生、陈醒迈是化学系1963级学生，程汉良、刘立民是技术物理系1963级学生。1967年3月份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革和北大的问题，观点比较一致，后来发起组织了“北京公社”。1967年8月北大的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陈、程先后进入兵团总部，齐、刘先后成为03纵队和17纵队的负责人。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后，他们之间的一封信被化学系某女生拿去上交，信的内容是对文化革命和中央文革有所怀疑和不满。于是他们被当成“反动集团”受到隔离审查，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审讯逼供，他们的女朋友也都被迫交代和揭发他们的问题。1969年11月，程、刘随技术物理系师生去了陕西汉中分校，陈、齐去了北京郊区农村。

1970年3月，63～65级学生毕业分配，程、刘被当成有问题的人留在分校继续审查，过了3个月，程因态度较好被准许毕业，分配到陕西安康地区石泉县，刘因“态度顽固”，经常用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和工宣队辩论，一直到1973年春节才准许毕业，分配到河北衡水。

这四个人都喜好读书和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刘立民曾对班上同学说过：“文化革命不过是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群众是被愚弄的，再过10年就清楚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落实了政策。刘立民后来在武汉工作，成为电子电气和自动化方面的专家。刘立民2008年10月因工厂事故不幸遇难，葬于北京门头沟万佛陵园。程汉良居住厦门，是成功的企业家。齐菊生旅居美国，陈醒迈在大连安居。2018年～2019年，齐菊生回国，和笔者、樊能廷共同回忆当年遭遇。

以上组织和人物虽然情况和遭遇各异，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

他们都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其中很多人读过大量书籍，有一定的才华。

由于他们观点有些超前，往往得不到当时多数人的理解，被视为异端，更不能见容于当权者，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到批斗甚至被关进监狱。

他们在文化革命后继续从事各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从事教学、科研或经营企业者等则比较稳定，少数人参与政治斗争，则下场不好。

这些也许就是北大人的特点与宿命吧！

□ 来源：原载《燕园风云录》第2集，写于2013年5月，2019年有补充。

~~~~~

【往事非烟】

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

• 何子溪 •

1966年6月，伟大领袖振臂一呼，全国上下便陷入一片狂热和疯癫之中。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工厂停工，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大、中、小学的学生全部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来的许多当权者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纷纷被拉下马，成了专政的对象，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和尊严，被戴上高帽子到处游街示众。与此同时，“破四旧”也如火如荼。除了毛泽东和马、恩、列、斯著作外，其它一切书籍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封资修的东西，甚至连男人留的胡子，女人的长发，身上的裙子和高跟鞋也统统成了革命的对象，统统列入到横扫之列。

记得我们北大核物理班的罗泽中同学原来留着很长的山羊胡子，常以美髯公自悦。文革开始以后，他却迟迟不肯把胡须剪去。一天在北大小南门外偶然碰到了一群“破四旧”的红卫兵，十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围着他非要剪掉他的胡子。罗同学一手捂着胡子，一手抵挡众人明晃晃的剪刀，嘴里还不停地辩解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长的胡子还不是一样闹革命嘛！”但中学生们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他剪成了秃嘴巴。尽管他大喊大叫，极力反抗，但仍然无法抵挡众多红卫兵的强大攻势。

一时间书店关门，图书馆被查封。因为马克思喜欢红色，于是红色便成了革命的象征，举国上下凡是能涂上颜色的地方一律被涂成血红色，神州大地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就连那“无产阶级恐怖万岁”的大标语也要在下面滴上几点类似人血的红墨水，以示革命者的无畏与无情，看了都令人毛骨悚然！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看到这类标语时总是感到不寒而栗。当郭沫若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统统付之一炬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和走资派的家藏书籍被抄。更多的人害怕引火烧身，纷纷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当作废纸送到了废品收购站。

学生们怀揣一本红宝书就可以包打天下，成了自己革命的唯一精神食粮和本钱。专业书是绝对禁止的，否则会给你戴上“白专”的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它文学艺术类的书籍也统统被列为禁书，即使你想看也找不到，这对于渴求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痛苦。偌大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成千上万的大、中、小学生正处于追求知识的年龄，整天无所事事，无书可读，那滋味实在不好受。当然也有一批天不怕和地不怕的人敢于顶风而上，自谋出路，那就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放化专业330班的一帮“痞子们”。

在文化革命中，提起技物系的330班，恐怕全北大几乎无人不晓。他们思想活跃，无视各种禁忌，蔑视当时疯狂至极的极左思潮，更不满各种打砸抢的过激行动，敢于直抒自己的意见，顶风而上。大家当然也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只好采取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发泄自己的情感。

文革前海淀有一个旧书店，是北大穷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文革不久，八一中学的一帮红卫兵声称是封资修的黑店而要查封它。这下可惹恼了330班的一批旧书店的老主顾，我们班十几个同学主动出击，连续几天与那帮左得可怕的中学生们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拉锯战。激烈的辩论甚至推推搡搡使一些好心市民们都为我们担心，偷偷地劝我们不要与有组织的红卫兵对抗，但“痞子们”还是据理力争。当然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穷凶极恶的滔滔洪水，没能挽救旧书店被查封的命运。这使我们认识到，在那个极度疯狂的年代，有组织的极左行动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为读书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我们班里外号叫“萝卜”的同学可以算是众多“痞子”中的佼佼者，地地道道的北京油子，调皮捣蛋的高手。因为从小生活在北京，又特别爱交际，所以老北京的大街小巷他都非常熟悉。他为人义气热情，乐善好施，结交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都有，因此知道的事情也特别多，常常向大家传播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此兄长得五大三粗，像个典型的农民兄弟，但人却非常聪明。他安装的收音机其质量无论是音质或灵敏度，甚至选择性上无人能比。他那无师自通的木工活也相当于五级工的水平。

正当大家因精神匮乏而饥渴难耐的时候，陶令煌和“萝卜”偷偷地告诉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东直门外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最近收购了许多“四旧”书籍！问题是我们以什么名义和什么方法才能搞到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第二天一早在陶令煌和“萝卜”的带领下，我和程汉良、俞小平五人便直奔东直门外。我们以北京大学为工人同志送中央首长讲话资料的名义，与收购站的领导接上了头。当时北大可谓是文化革命的圣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威名全国，不仅她本人一时间红得发紫，连北大的学生也跟着老聂沾光，到处受到人们的赞美和推崇。那位领导看到北大学生亲自将中央文件送到一个废品小站，真是感激涕零，一再表示感激之情。

“假传圣旨”意外成功后，我们提出希望从这里购买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那领导看来文化程度不高，他本来就对北大的学生充满崇拜之情，又听说要从旧书中选购一些马列的著作，学生爱学习是好事啊！自然是满口答应，慷慨应允我们随意挑选。“阴谋”得逞了，“满怀鬼胎”的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来不及道谢，纷纷向那一座座小山一样的书堆冲去，各自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

这里的各类书籍堆积如山，品种也极多。虽然也有政治书籍，但大部分都属于“禁书”，这使我们欣喜若狂，真想把所有的书都统统带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只好拼命从其中翻找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我喜欢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诗词，程汉良和陶令煌喜欢西方小说和哲学，俞小平则喜欢欧美和苏联的侦探或科幻小说，“萝卜”只捡些中国武侠小说和无线电之类的科技书。大家各取所需，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一刻不停地在书山中翻找，忙得连午饭都顾不得吃。从早晨八点一直翻捡到下午五点，每个人都挑了一大堆。虽然个个都累得腰酸背疼，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矿工一样，身上和脸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但心里还是充满着发现新大陆和如获至宝的喜悦。

书挑好了，下面的问题是如何瞒过收购站领导的眼睛，把我们的辛苦收获顺利带走。又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在陶令煌的提示下，我们把每本书的书背朝里，再将两摞书背对背地并在一起，这样从外面就看不到书籍的名字。然后又在每一捆书的上下各放上一两本马列的著作以掩人耳目，最后用绳子把它们横七竖八地紧紧捆住。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那位领导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表面，便以每公斤0.27元的收购价过秤交钱。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十公斤，匆匆忙忙地扛到门外，由“萝卜”从家里找了一辆地排车，一路谈笑着拉回了学校。

既然是禁书，阅读时也必须特别小心，决不能让不熟悉的人知道或看到。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看这类书籍是十分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或封资修的孝子贤孙。有多少人只因无意间说了一句错话甚至梦话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又有多少朋友、亲戚、兄弟，甚至父子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反目成仇！我们系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就因为梦中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刘少奇的名字，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好在我们班的同学思想比较开放，相互也比较理解、宽容和信任，又善于把政治问题化解成恶作剧式的笑话，就连最革命的人也很难抓到把柄。这批书成了大家争相阅读畅销品。我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

始系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并且与好友老郑一块欣赏和评论。如果说十年文化革命还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大概就是认真阅读了这些宝贵的书籍，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和阅历，提高了自身的文学素养，也算是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救赎吧！

后来我们几个兴犹未尽又去了一次那个收购站，仍然如法炮制，很容易地又挑选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哲学和文艺作品。领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很想感受一下异域文化的风味。这一次我挑选了大量外国名著，包括世界历史、西方哲学和文学名著，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猎人笔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选》；伏尼契的《牛虻》；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格列佛游记》；夏绿蒂的《简爱》；莎士比亚的戏曲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斯汤达尔的《红与黑》，莫泊桑的小说选等。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天才三部曲》，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另外还找到了几本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的哲学著作等。

从这些西方小说和历史哲学著作中我逐渐理解了科学、民主和自由的含义，领略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脉络、动力和欧美文学的写作风格。另外，对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的价值观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后来几次搬家，这些书虽然大部分都丢失了，但从中学到的知识和由此产生的人生感悟却没有丢掉，而且终身受益，这些书籍不仅帮助我渡过了漫长而无聊的文革岁月，而且对我以后研究科学史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革耗费了我们十年的大好年华，给同学们的身心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惨痛的影响。但每当回想起那次买书的经历，仍然感到幸运和高兴。

（作者简介：何子溪，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化专业，1970年于文革中毕业，1979年至1981年回炉到北大进修，1981年再次毕业。）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

~~~~~

## 【亲历者言】

###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六）

· 阎长贵 ·

（上接 z k 2 0 0 5 c）

### 十六、江青最嫉妒和忌恨王光美、宋庆龄两位女士

嫉妒和忌恨是丑恶的人性。这种人性在女士中往往表现得比较明显。江青作为女人就是这样。嫉妒和忌恨有个前提，就是地位相同或接近。据我看，在中国江青最嫉妒和忌恨有两位女士，一位是王光美，一位是宋庆龄。宋庆龄是从前的国母（孙中山夫人），王光美是当时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夫人，论起来，她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地位，绝对“应该”低于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但到文革前为止，江青反而从来没有享受过像宋庆龄和王光美那

样的在公众面前耀眼的荣光，所以她非常嫉妒和忌恨。文革中，江青有了权力，她就要发威、逞凶、施虐。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江青在文革中嫉妒和忌恨王光美与宋庆龄的一些情况。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十一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十六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叫到小会议室，向他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他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他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她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王广宇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王广宇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他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他又不知道宿舍，特别是女宿舍在何处？为难时他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他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王广宇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王广宇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他原原本本地向小潘传达了关锋的话，但他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王广宇，知道他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小潘一再向王广宇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王广宇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王广宇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王广宇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

先王广宇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王广宇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中央文革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王广宇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他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他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王广宇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王广宇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他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他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侮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现场纪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王广宇断定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关锋生前曾问过他。我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词，隐去了他布置的情节，但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广宇还告诉我，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的情况。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



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叫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仍然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下面，我再谈谈江青嫉妒和忌恨宋庆龄的情况，其最突出的，就是江青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的事情。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该月上旬的一天，戚本禹从江青住的钓鱼台11号楼回到16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住地），跟我说：应该找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到人民出版社去造反，质问他们纪念孙中山诞辰，为什么要出《宋庆龄选集》？戚这样说了一下，但并没认真责成我去做。当时诸事繁杂的我也就没有“贯彻落实”。幸亏这件事没有去做，如果去做了，不论对戚本禹还是我，都是又一桩孽债。戚这样说，肯定是传达的江青的意思。江青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损招？我认为，这是她出于嫉妒和忌恨宋庆龄的阴暗心理。

关于这件事，其情况是这样的：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百年华诞，重印了1956年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当工作人员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到江青面前时，她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就像发了疯一样伸手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335页）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她知道宋庆龄在解放初时曾托人问候过我，就故意在我面前这样做，简直就像发神经。”（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8页）

经查证，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的是《宋庆龄选集》，不是《宋庆龄文集》。江青在这件事情上歇斯底里，确如陈伯达所说，“简直就像发神经”！

江青为什么对出版《宋庆龄选集》这样歇斯底里和“发神经”，深刻原因和远因，我们姑且不去探索，最近和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文革开始不久，即红八月“扫四旧”和“打、砸、抢、抄、抓”过程中（或之后），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去向宋庆龄解释文革，宋向江青说了令江青（和毛泽东）不满的话引起的。宋庆龄究竟说了什么令江青不满的话？据说，江青到宋庆龄住所，经过简单的寒暄，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文革的兴起和“伟大意义”。当江青夸夸其谈地一味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听到宋庆龄这样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态度一下子变得冰冷，感到受了“侮辱”。（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

页)众所周知,当时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受到最高领袖的热烈和高度赞扬,江青也称红卫兵为“小太阳”,江青对宋庆龄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显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江青如此激烈地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即她这样报复宋庆龄,是她权令智昏、公报私仇的丑恶政治品德的突出表现,也是她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某些女性负面心理的反映。

## 十七、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亲属关系,我知道的很少,所谈的也只能叫做“拾零”。大概是在1967年春天,我陪江青坐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江青在车上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远新又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就是说对主席也可以“轰”。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依我看,李敏和江青的关系不很亲密。我在江青身边一年的时间里,她让我给江青转过信,信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的办公室或叫人转给我,我没见过她本人,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她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和从文字材料上看到。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主席,都是分开去,单独去。李讷、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他们二人还到车站去接。据我感觉,李讷和江青关系还是好的,毕竟是亲生母女关系嘛。李讷的工作单位是《解放军报》,她所谓回家,就是回到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里,中南海丰泽园也有她的住室。

李讷、李敏、毛远新他们一般不和毛主席、江青一起吃饭,都是到大食堂吃饭。在中南海这样,在钓鱼台也这样。偶尔江青叫李讷一起吃顿饭,李讷都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留我吃饭了!”我们也为她高兴。李讷到大食堂吃饭不方便,一般是警卫战士帮她从食堂打回来。江青不只一次嘱咐我们:“给李讷打好饭。”这“好”不是说给她买好吃的东西,而是做好给她打饭或带饭这件事情。我们和警卫战士也都把这件事情当作重要的任务尽心尽力做好。

江青对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对李讷主持《解放军报》,无疑是支持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

在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江青跟我说:“你是写文章的,你也可以写一篇吗!”我说:“太忙,没时间。”江青说:“抽点时间吗!”——我想江青叫我写这篇文章是要我支持李讷主持的《解放军报》。当然,对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感到是对我的信任,也感到很光荣,下决心写一篇,也在江青面前表现表现;说实话,没有江青这样的交代,我是不能,也不敢写这篇文章的。当我把文章《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写好后,江青叫我送给陈伯达和姚文元帮助修改,修改后交《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说不看了,姚文元给看了,并做了修改,具体做了怎样的修改记不清了,但他把我文章的题目改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即加了“反革命”三个字,其印象是很深的。这篇文章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当时,江青参加的会很多,什么接见造反的群众组织啦,什么处理哪省或哪个单位的问题啦,这样的会,江青有时让我通知李讷也去听听,看看。毛主席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感到愕然,就跟李讷说:“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讷说:

“这是规矩；你们工作人员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也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

我当江青秘书，但我并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对我是直呼其名。大概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过，很熟，虽然后来我当了她妈妈的秘书。总起来说，当年我对李讷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觉得她朴素、大方，没有架子；不过有不少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她有点霸道，也有人让我劝李讷，叫她注意一点，但我没有去做。

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建国后，他妈妈朱丹华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在北京的小学、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去“哈军工”，毛泽东说：“推荐算什么本事？！”毛远新就参加统考，考上了清华，后来还是转学去了哈军工，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清楚，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一个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并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多是住在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

毛远新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喜欢他。而江青当时对他似乎不很“感冒”。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兴地说：“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孙占龙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江青这样说。大概是1967年的5、6月份，毛主席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的联合问题，即宋任穷一派和陈锡联一派的联合问题，因为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新在我办公室正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的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能当好”，等等。江青也许是刚从毛主席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很显然，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主席的态度为转移的。

人们只知道毛远新在文革后期做过毛的联络员，这一次大家还不了解。也可以看出毛对他的信任和栽培，毕竟是一家人。

毛远新2001年退休后，来京时，曾到我家做客。他告诉我：在1975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和她娘家人似没什么来往。我经历过一件事。1967年冬天江青的嫂子来北京，给江青写信，要见江青。这是她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的妻子，家在济南。我拿着信报告江青，江青没好气地说：“我不见她！”我问：“那怎么办？”江青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我感到无奈，不知怎么办好。我只能请示我的顶头上司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这个情况后，汪东兴笑着说：“她嫂子不用她见，也不用她管；她嫂子来无非是想要点粮票要点钱，由我处理就行了。这件事不用报告江青同志。”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按照汪东兴的嘱咐，我没报告江青；而江青后来也没问过这件事情。江青为什么对她嫂子这么冷淡，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 十八、我被江青诬为“坐探”，关押八年

我万万没想到江青会把我关起来。起因是一封群众来信。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位女演员或工作人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同志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还说了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还误以为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便去请示江青。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

“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是说信的内文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问信上说的事是不是与她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由于我的大意而产生的误解。其实，写信人和信的内容与江青根本没有关系。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误解，竟使得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严厉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胆怯地问她：“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过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受到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日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

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天壤之别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也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365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是鬼使神差吧！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还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

其他什么结果，当时一点都没意识到！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声慢气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说：“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都炸了！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在江青身边的“钉子”？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的心绪乱极了。

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

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瞬间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天条”，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下子脑袋胀得很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成红脸，面对着我：“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模模糊糊地觉得他是劝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于是我连连点头，说：“是啊，有什么就谈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着他的口授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我爱人和儿子，刚从山东农村来北京不久，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战士的家属宿舍。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1968年1月24日深夜，我由荷枪实弹的两名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驶离了钓鱼台——这个留下我特殊记忆的地方，在凛冽的寒风中驶往一条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里有一座黑森森的监狱——秦城！从此我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创造业绩的八年时光。

关于我爱人和孩子的情况，我8年后，从监狱开释又流放湖南一农场，和从山东老家赶来的妻子、儿子见面后，才知道，在将我押往秦城的时候，陈伯达等还布置了一次抄家活动，到我爱人和孩子临时住的警卫连家属宿舍，翻箱倒柜，搜身检查，等等，实际上，他们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陈伯达为了让此次“抄家”能有所获，前面我已说到，他逼迫我给妻子写的那封信，内容是：“××：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前去看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很可能也是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之后，警卫部队又把他们连夜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的招待所软禁起来。5月，即麦收前，根据我妻子再三再四地要求，才把他们送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他们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成为“反革命家属”，孩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叫念了，年龄仅仅13岁勒令参加农业劳动，全家老老少少都受到歧视，哭诉无门。

我到秦城监狱后，换了黑色囚衣，代号“6820”，大概我是68年第20个关进来的“犯人”吧，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

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来打发漫漫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简直是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有与人对话的机会，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我这个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实在难以应付这空寂的时光，无奈，我除了数暖气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复背诵从前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和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填词。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我除了“一张报纸看一天”外，就是翻来覆去地读《毛选》。几年下来，《毛选》从头到尾我读了三十多遍，有的文章，如《论持久战》甚至读了一百遍以上。刚出监狱时，毛泽东2000字以上的语录，只要是《毛选》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找到，——现在老了，不行了。

我在秦城监狱关了七年零五个月，八个年头。提审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是没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体会不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环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见到太阳，见到天了。

我蹲监狱七、八年，精神没有萎靡，没得精神病，这是值得欣慰和庆幸的。我走出囚禁七八年的监狱，才知道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话，出狱后本来可以允许我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东，所以我提出要取当年存放在《红旗》杂志宿舍里的衣物和书籍时，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东西都让你的儿子取走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听说儿子已是中学生，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我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年前……

江青诬我是“坐探”，她有什么根据？说实在话，我不清楚。除了我和关锋是师生关系，以及我曾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其他别的，连猜都猜不到。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很久，到了2000年前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

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即哲学社会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这时，她说：

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他们”是指我和戚本禹，所谓“被支走”是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而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笔者）。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

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编故事编出来的，栽赃陷害，血口喷人！

现在人们看到江青这些话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连眼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七八年，你说荒诞不荒诞？而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法律！

1967年夏天，我在聊城三中读书时的班主任牛其光老师，来京看我们班的同学，致我一信，告我他住的旅店，希望我见见他，我时任江青的秘书，实在抽不出时间，我托在京的邮电学院毕业的同班同学魏茂挺代我去看牛老师，他回来后告诉我和牛老师相见的情况，他特别提到牛老师在谈到我时说：“……我很为长贵担心，‘伴君如伴虎啊！’”，对牛老师这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因为年轻没怎么在意，然而恰恰被牛老师言中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江青就诬我为“坐探”，投入监狱关押起来。——古今皆如是，这也算一条历史警示吧！

## 十九、所谓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

1983年5月14日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中谈江青的“残忍”时，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参观。她认为小靳庄是她的一個代表作。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也是多么残忍！”（《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江青确实非常残忍，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摧残和迫害了数不清的人，很多人被她摧残和迫害致残、致死；但胡乔木把这件事情作为江青残忍的例子和证明却不符合实际。

1974年8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中国访问时，江青确实陪她去了天津市的小靳庄。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最近向江青当时的汽车司机李子元和护士赵柳恩作了调查和询问，他们说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李子元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有一个很大的车队，北京去了很多车，天津也有很多车。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开的江青的车及其前导车和后卫车绝对没有这个事。至于是否其他车，如地方的车，撞没撞人，我没有什么印象了。赵柳恩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我去了，在车上就坐在江青旁边，肯定不是江青的车及其前面和后面的车撞死了人，如有这事我印象一定会很深刻。模模糊糊记得（到小靳庄后听人说）前面有车撞了人，江青等人的车也没让停就过去了。

她又说，这件事情中央警卫局二处去的人一定清楚，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警卫和保卫工作的。热心和负责的赵柳恩接着又帮我询问了中央警卫局二处的有关同志，继而告我：中央警卫局二处的同志说，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车撞死了一个人，善后工作也是天津的同志做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说为这件事，“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这是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的事，因为江青和马科斯夫人乘坐的不是一辆车。恐怕江青，更别说马科斯夫人了，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江青虽然是坏人，但对她也要实事求是。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知道胡乔木同志根据什么材料告诉外国记者“这样一件事”。既然事实不是这样，尽管出自胡乔木之口，也不要再继续以讹传讹了。

（全文完）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